

# 姚莹 外攘内治 报国安民

马军



## 妙手稳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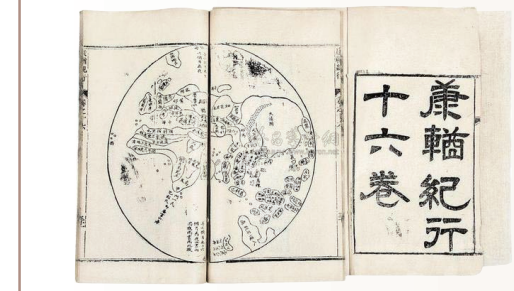
1816年春,姚莹接任福建漳州平和县知县。当时,这里的自然条件极为恶劣,除了深沟险壑,就是湍急的溪流,几乎没有平坦之地,百姓各自依山而居,自然形成以家族为单位的小社会。“平和地界阔,自古为盗贼之藪,自王文成平寇乱而始建邑。其地溪岭深阻,穆篁丛密,无三里五里之平远,岩壑蔽亏,彼此悬隔。民皆依山阻水,家自为堡,人自为兵,聚族分疆,世相仇夺,故强凌弱,众暴寡,风气之顽犷。”这个长期相对封闭的小社会,矛盾错综复杂又十分尖锐。

姚莹到任后,决定以信、廉、威、恩四字打开局面。要立信,必须先清理积案入手,天还没亮,他便开始升堂办公,夜深人静,仍在条分缕析,每案必公,必无异议方结,令上下刮目,百姓信服。他坚持深入百姓之中切己体察,每到一地,必召集开会,讲遵纪守法的好处,践踏法律的危害,到会者必有奖赏,“朔望之期,择地适中高台宣讲圣谕,招集绅民庶环拱聆听,至者数千人,人皆予赏,莫不鼓舞欢欣,以为闻所未闻”。而一旦得到违法乱纪欺压良善者的真凭实据,迅即严惩,铁面无情。“他如观风、课士、宾兴、乡饮之礼,以次举行,欲令陋陋陋渐知礼教”,姚莹大力倡办文化和教育,移风易俗,鼓励生产,发展经济,平和的风气明显改观,百姓们从心里佩服这位清正廉明的姚知县。

由于治绩突出,姚莹被调任漳州府的首县龙溪任知县。依例,首县要与上级府同城办公,再加上漳州地位十分重要,因此,他将与总兵、道台、知府衙门比邻而居。

龙溪的治理比平和县难度更大,“其民习于强悍,恃众藐法,久为通省最。东万松关,南九龙岭,劫掠不已,行者戒途;北溪一路七十余里,截河临征者数十处;城内文武、兵役夜巡,如临大敌;至于各乡,大小一千有八社,积怨深仇,蔓延滋斗,视杀人如草芥,以虏劫为故常,一日之中,或十余命,一岁之内,伏尸盈千”。这里的百姓习于械斗,民风强悍,结社甚多,结怨甚深,战场随处可见,命案习以为常,官府人多则一哄而散,官府人少则群起而攻。

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姚莹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智慧。首先,他亲自率领县衙捕快,深夜入势力最大、影响最坏,也是最为险恶的“社”,一举将首恶分子拿下,迅速申明其所犯的一桩桩重罪,于城门外向百姓公布其罪状,并押着他们到曾经做过下坏事的各地教育群众,然后



姚莹,字石甫,安徽桐城人,嘉庆十三年(1808)进士,先后在福建、江苏任地方官。他办事干练,诛奸抑暴,无论贫富秉公断狱,被誉称“闽吏第一”。嘉庆二十四年春,姚莹调任台湾知县,在台政绩卓著,受到当地官员和百姓的衷心爱戴,“所至士民好之”。特别是他率领台湾军民浴血抗击英国侵略军,为保卫台湾捍卫民族尊严立下不朽功勋。姚莹诗书满腹,熟知军事,是个名副其实的儒将,《冷庐杂识》这样评价他:“负经济之学,尤长于论兵。”

召开万人大会,并就地正法。境内劣迹斑斑的不法之徒,闻风丧胆,敛行匿迹,治安效果大为好转;其次,他发布公告,对于有悔过表现的从恶者给予自新机会,劝谕他们立即改邪归正,对于胆敢继续顶风作案者严惩不贷。如果谁有冤情欢迎到县衙申诉,一定给予公平裁决;然后,他又亲自接见乡间富有威望和号召力的族长和乡绅,晓之以理,约之以法,劝他们约束子弟,侵占他人土地和产业的,各自归还;烧了别人房子的,负责给人修葺好,并适当赔偿;对孤儿寡母,发动族人给予养恤;对负有命案者,官府不再抓捕,而是由其家长自己捆送到县衙,量刑时可视为自首适度从宽。

姚莹的胆识、魄力和干练,使乱作一团的龙溪迅速稳定下来,儿童开始读书,各家筹谋桑农,日子日渐红火,百姓自此安居乐业。漳州知府大为赏识,不时向姚莹征求施政方面的意见,闽浙总督也是钦佩不已,高度评价姚莹的政绩,推他为“闽吏第一”,凡有赴漳州任官者,都指示他们向姚莹学习。两年后,朝廷决定调姚莹任台湾县知县,漳州士民纷纷上书要求留下姚知县。为尊重民意,这个任命略作调整,姚莹再在龙溪呆几个月,转年春再赴台湾,因为那里更需要他这样的官员。

## 浴血守台湾

这是姚莹对一支精兵队伍的形象描述:“训练士兵,当以耐受劳苦为首务。手执锐戈利矛,身披重铠坚甲,即使滴水成冰的数九寒冬,抑或遍地流火的盛夏酷暑,在大敌当前,也将一如往常,钢铁劲旅,滚滚向前。如果平时不从难从严,苦练实练,在艰苦险恶条件下,怎么能够如

履平地,奋勇前进呢?所以要想练出过硬的杀敌本领,就要让他们善于在负重情况下奔跑,白天能在荆棘丛中行走如飞,夜晚能在冰雪满地的野外酣睡,寒时可赤身露体,热时可棉袄棉裤,兵能练到这样,就可以放心地在战场上建功立业了。其次是勇敢。战场是异常残酷和血腥的地方,胜败往往就在一眨眼间,勇气和胆力不足是致命伤,而这都是平时的功夫罢了。百战百胜,所向无敌的铁军,无一例外都是胆大包天的特殊人群,敌人在他们眼里就和没有一样。如何训练胆量和勇气呢?古代名将有着现成的经验,或者让他们在眼看就要崩塌的绝壁上睡觉,或者把他们放在猛虎和豺狼的巢穴,使他们在生死存亡之际仍能心不慌、意不乱,这样,勇猛虎狼之兵就算练成了。”

姚莹的真才实学和真知灼见,让两江总督陶澍、江苏巡抚林则徐十分欣赏,皆认为“可大用”,尤以林则徐的举荐为恳切,他说姚莹“学问优长,所至于山川形势、民情利弊,无不悉心讲求,故能洞悉物情,遇事确有把握。前在闽省,闻其历著政声,自到江南,历试河工、漕务、词讼听断,皆能办理裕如,武进士民,至今畏而爱之”。由于重臣力荐,姚莹被派往台湾担任知县兼海防同知,道光十七年(1837),被提拔为台湾兵备道,加按察使衔,成为台湾最高行政官员。

姚莹一踏上台湾土地,即深入民间,详细考究历史、地理和乡土人情,他所写的《东槎杂记》五卷,至今仍对研究台湾史地,特别是台湾少数民族生活情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姚莹生活俭朴,一身廉正,知之者无不佩服。他非常注重当地人民的文化教育,“立学校、教士习”拿出家藏书目,供在院肄业诸生学习”。他关心民众疾苦,视百姓如亲人,解职离台时,军民夹道跪拜20余里。

值得大书一笔的是鸦片战争期间,姚莹率领台湾军民浴血奋战,捍卫国土和民族尊严的英雄壮举。

1840年7月,英国一艘双桅船侵入台湾鹿耳门外海面,被姚莹派兵击退;1841年7月,英军三艘三桅船再次来犯,又被打得落荒而逃;1841年9月,英舰纽布达号驶入基隆港,重炮轰击二沙湾炮台及兵房,中国守军狠狠还击,英国兵舰受重创,于逃窜中触礁沉没;1841年10月,英军又一次卷土重来,并在炮火掩护下强行登陆基隆,在姚莹指挥反击下,登陆英军被全歼;1842年3月,英舰载重兵疯狂攻击台湾大安港,来势汹汹,气焰嚣张,姚莹将英军舰引入“暗礁林立”的土地公港,使其“搁浅中流”,然后发动强大攻势,从而大破英军。

这五次胜仗,共击毙英军130多名,俘虏200余名,还缴获大量武器弹药。

姚莹五战五捷,不失寸土的辉煌战绩,不仅沉重打击了英国侵略者在所谓“东亚病夫”面前不可一世的嚣张气焰,令国际社会震惊不已,也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台湾人民反抗侵略、敢于斗争的信心和勇气,在中华民族不屈不挠抵御外侮的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

## 泰然对危机

鸦片战争致中国丧师失地,成百年之痛,然而兵备道姚莹会同总兵达洪阿领导台湾军民的抗英斗争却取得五战五捷的重大胜利,从而成为这场屈辱战争的一个亮点。

捷报飞来,道光帝喜不自胜,欣然朱批:“览奏,嘉悦之至。”“可称一快,甚属可嘉!”“可嘉之至!”“稍纾积忿!”“可称大快人心!”“尤其称

## 雅贿

晏默存

韩彦古是南宋抗金名将韩世忠之子,一个“将二代”。他先后出任过将作监丞,多地知州、知府,官至户部尚书,可谓经历广、资历深、背景厚。倘无意外,登台辅当宰相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韩彦古狂妄荒诞,品格低劣。他任户部尚书时,合门寄班(礼仪官)董珪在路上与他相遇,没按规定回避,他勃然大怒,竟把董珪抓回家,脱去衣服毒打一顿。入仕以来,皇帝案前弹劾他的奏折就未曾间断过,有御史弹劾他居家不检,放纵专横;有同僚状告他贪污腐化,盘剥百姓。然而,尽管物议沸腾,他照旧边腐边升,边告边升。究其原因,除他是功臣之后,皇帝眷顾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特别擅长行贿,其出手之大方,用心之细密,态度之执着,技艺之高超,几乎前无古人。从他向历史学家李焘行雅贿便可略窥一斑。

李焘与韩彦古同朝为官,官至数文阁学士兼侍读,是皇帝宋孝宗的顾问大臣。由于韩彦古品格不高,名声不好,李焘“恶其为人,弗与交”,高调拒绝与韩彦古来往。李焘廉洁奉公,素有清望,深得宋孝宗的欣赏和信赖,被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宿儒所厌恶,是十分危险的事情。

如何摆平李焘呢?韩彦古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他知道,李焘刚刚写完《续资治通鉴长编》草稿,宋孝宗正催他赶快编辑、誊正进呈。然而,卷帙浩繁,进度缓慢,李焘一筹莫展。于是,韩彦古故意放出话来,说他家里有一部本朝野史,乃乃父韩世忠得于北方沦陷区,极为珍贵,秘不宣人。李焘听说韩彦古有此珍贵之书,正好可以参照,便撕破老脸,亲自到韩彦古府上请求一阅。

韩彦古见李焘中计,故意卖关子说:“这是祖上密藏,即将进呈皇上,不可轻易示人。”韩彦古越是神秘,李焘越是想先睹为快,又再三恳求。韩彦古说,要看可以,你得先陪我喝酒。李焘

快!”“朕喜悦之怀,笔难罄述!”举国上下一致盛赞姚莹为国之栋梁。

台湾的一枝独秀,让以琦善为首的投降派恨之人骨,竟以英国人的数字为依据污蔑姚莹等“冒功”,犯下“欺君罔上”重罪,再加上英方代表璞鼎查不断施压,姚莹被撤销职务,摘去顶戴,押回京师,入狱为囚。台湾士民兵丁震惊不已,“精兵千人攘臂嗷呼,其势汹汹,达镇军惧激变,亲自循迓,婉曲开譬,众兵乃痛哭投戈而罢。土民复千百为群,日匍伏于大府行署,纷纷金呈申诉者,凡数十起”。由于朝内正直大臣和台湾各界的拼死抗争,姚莹才改为发配,“姚莹著以同知知州,发四川补用”。

此时,任四川总督的是投降派一党党魁罗兴,这是他与姚莹首次见面时的对话:“闻台湾产金,信乎?”公对曰:“某通籍二十年,未尝见此。”“本来就有金,索金又不成,党罗兴遂心生忌恨,“由是有西藏之役”。因此,姚莹甫至即被派往西藏调解部落争端。

那时的西藏与四川,交通极为不便,自然条件更是恶劣无比,“往返六七千里,道经绝漠”“冰山雪窖中,崎岖备至”。之前所派诸人,皆无功而返,姚莹此去,愈加艰难。前路漫漫,危机四伏,戴罪之身,凶多吉少。姚莹认为,这是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需要朝廷显示足够的权威,“此非振之以威不可”,建议委派威望素著的大员前往,自己为副,至于个人祸福,则不在姚莹考虑之内,“莹失职下僚,孑身往,徒损国威”。而党罗兴根本不屑,斥为小成大做。

姚莹经历过无数的艰难险阻,他从未怕过难、畏过险,西行的路上他“处之如恬,途中诵读吟咏不辍”。鸦片战争的硝烟虽已渐渐远去,但其惨痛教训一直萦绕在姚莹的心中,他认为正是由于国人普遍对世界茫然无知,才导致“不待兵革之交,而胜负之数,已皎然者矣”的屈辱结局。

基于这个认识,姚莹一路上对所经地区的山川、地形和风水人情,特别是涉及西方世界的消息、传闻、资料、书籍、实物等,都进行了详细的记录、考究和梳理,最后写成了16卷的《康輶纪行》一书,该书对英法历史、英俄、英印关系,印度、尼泊尔、锡金入藏交通要道都有所阐述,尤其注重考察西藏地区情况,特别提醒人们要警惕和防范英国侵略者染指西藏的图谋。该书的主要内容,正如姚莹在自序中所言:“大约所记六端:一乍雅使事始末,二刺麻及诸异教源流,三外夷山川形势风土,四入藏诸路迢迢,五泛论古今学术事实,六沿途感触杂撰诗文。”

姚莹在书中提出,要抵抗西方侵略,必须学习他们的自然科学技术,并要知己知彼,真正搞清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莹为此书,盖惜前人之误,欲吾中国稍习夷事,以求抚驭之方耳”。这部书和魏源的《海国图志》、徐继畲《瀛环志略》一起,对启蒙中国早期的近代思想,可谓其功非小。

委屈面前,姚莹没有怨天尤人,因为他的初心就是报国安民。危机面前,姚莹没有倒下,更没有一蹶不振,而是负重前行,坚忍不拔。正是因为姚莹的泰然自若、从容不迫,使他终于由“危”转“机”,否极泰来。咸丰帝即位后,姚莹因“在台湾尽忠尽力”之功,被重新起用,以广西、湖南按察使殁于任上。

天津被称为曲艺之乡,近代历史上遍布城乡的戏园尤为著名。随着近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变迁,天津戏园从戏台布置、观众人群、演出内容乃至名号称谓等各方面,都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沧桑巨变,这些变化也是中国

社会向近代化转型的一个时代缩影。早期的戏园叫茶园,出现于19世纪初,是一种营业性演出场所。茶园的舞台为伸出三面敞开的戏台,台口两旁有两根柱子,上横沿有铁栏杆,专供武戏演员表演特技。舞台上设八仙桌和凳子,观众围着八仙桌相对而坐。在茶园,人们一边喝茶,一边看戏,以喝茶为主,看戏为辅。观众看戏不需买票,只付茶资。茶园不需要对号入座,观众购票入场,自行选择座位。受照明条件限制,茶园每天只演日场,从无夜戏。冬日天短,遇有戏未终而日已西坠,由于戏台上忌用蜡烛,便燃起亮子油松等物以代蜡烛。

天津茶园发展迅速,清道光四年(1824年)崔旭撰成的《津门百咏》就有“戏园七处赛京城”之说,戏曲名角在茶园的演出激发了茶园的兴盛。清光绪初年,天津出现了比较出名的戏园,天津出现了比较出名的戏园,戏园名角在茶园的演出激发了茶园的兴盛。清光绪初年,天津出现了比较出名的戏园,戏园名角在茶园的演出激发了茶园的兴盛。清光绪初年,天津出现了比较出名的戏园,戏园名角在茶园的演出激发了茶园的兴盛。

清末民初,随着商业的繁荣发展和西式剧场的引入,观众的欣赏水平和要求不断提高。旧式茶园已经不太适应演员和观众的需求,一些茶园纷纷进行改造和扩建,传统戏园逐渐向现代化的新式戏园转变,名称也大都由“茶园”“戏园”变为“舞台”或“戏院”。如下天仙茶园,曾更名为下天仙戏院,1917年改名为天仙舞台,

## 天津戏园的变迁

贾鸽



1927年建成的春和大戏院,招牌上方有“梅兰芳”三个巨大广告

1919年更名为大新舞台,1925年改称新明大戏院。

现代化的戏院取消了茶座,设花楼、月台、排椅、包厢,有的还增设灯光布置设置。建于1915年的大舞台戏院,堪称天津一流戏院,梅兰芳、杨小楼、李吉瑞、尚和玉、李桂春、侯喜瑞等诸京剧、河北梆子名家都曾在此演出。清朝遗老、蛰居寓公、社会名流、富贾阔商都曾是该院的座上客,如庆亲王载振、军机大臣那桐、大太监小德张等。

这些戏院的出现,是天津早期的茶园向现代化剧场发展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演出内容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出现了文明戏。文明戏的表演基本以戏曲程式为主,同时吸取了话剧的写实手法。剧目内容是关于社会上发生的时事新闻,能够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理和娱乐消遣的目的,所以在天津舞台上风行一时。演出文明戏的剧社,鼎盛时曾有十几个,从业人员近千,演出剧目有几百个,影响颇大。后来,由于这种戏曲形式结构粗糙,缺乏艺术内涵,也没有形成固定的剧本剧目,因此逐渐在天津

戏院舞台上消亡。

自20世纪20年代以后,天津陆续建造和修缮了春和大戏院、北洋戏院、中国大戏院等拥有先进设备的新型剧场。这些新型剧场都在租界区内,主要是演出京剧,全国几乎所有的京剧名角都先后在天津演出。如1927年建成的春和大戏院,舞台为镜框式,建筑为钢筋框架结构。以前的打“手巾把”、索要小费的落后习俗被废除,并且规定了预先售票、对号入座等新举措,有效保障了戏院的演出秩序。

1936年建成的中国大戏院是天津剧场之冠,也是全国少有的一流剧场。该戏院是中法结合式建筑,戏院共5层楼,一二三楼设观众席,可容纳2000多人,剧场内没有柱子,任何地方的观众视线都不受影响。剧场音响效果很好,演员不需要话筒。戏院的建筑之完美、设备之考究,堪称华北一流。戏院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服务措施。戏院服务人员全部为正规考试录取,服务员着装整齐,女招待员身着白色学生装,男招待员着白色中山装制服。戏院有两部电梯供观众上下楼之用,电梯旁有电话,观众

可随便使用。为保持场内秩序,特设了专职稽查人员。

抗战爆发后,天津市面萧条,戏院业普遍不景气,唯有演彩头戏的园子一枝独秀,如天华景戏院、丹桂戏院、大舞台等。所谓彩头戏,指的是用新奇的道具和布景,以声、光、电、化等多种变换形式来吸引观众的舞台技术。有的剧团编演以机关布景取胜的彩头戏,使用近代的技术设备,吸收电影、话剧的表现方法,在艺术上进行了新的探索。如天津稽古社所演的24本连台本戏《西游记》,还有描写外国故事的《侠盗罗宾汉》《月宫宝盒》等剧目,这些剧目在表演、音乐、服装、化妆方面都有所变化和创新,迎合了普通市民的欣赏口味。

这一时期社会环境对戏院文化的影响很大,冲击着人们的日常生活。面对国家危难,有的戏院会演出一些宣传抗战救国的剧目,如坤班奎德社编排了《一个大学生》《战地之花》等剧目,在北洋戏院轮番演出,引发观众强烈共鸣。戏曲艺人纷纷竭尽所能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积极开展募捐义演,如周信芳曾在天津演出《明末遗恨》《卧薪尝胆》等剧目。

天津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于天津的旧戏院进行了扩充和改建,并新建了一些大型影剧场,主要演出评剧、京剧等。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评剧编演了数以百计的反映现实生活的新戏,在宣传政策、教育群众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这些现代剧目,大多是为配合当时的政治任务而写,时过境迁,失去了内容的针对性,因而很少能保留下来。而京剧在天津舞台上演出一直很频繁,自1949年天津解放初期至上世纪60年代,许多著名演员如梅兰芳、程砚秋、尚小云、荀慧生、谭富英、杨宝森、李少春、叶盛章、马连良、张君秋、裘盛戎等都曾来津演出。原在天津的京剧班社,开始排演解放区来的剧目和新编的历史剧。这些演出给戏院业发展注入了新活力,也让天津这座曲艺之乡在新的时期焕发出新光彩。